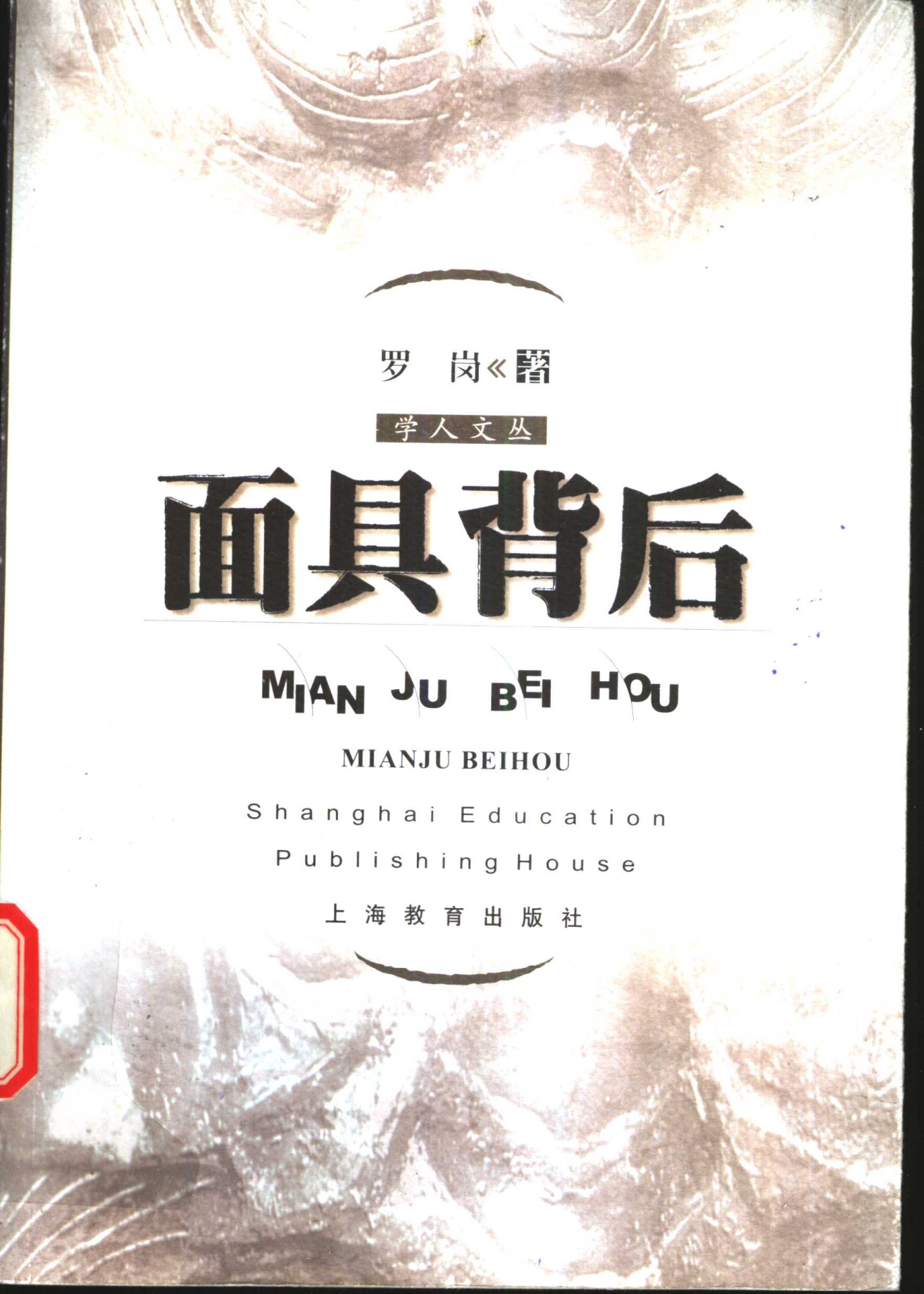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罗 岗《著

学人文丛

面具背后

MIAN JU BEI HOU

MIANJU BEIHOU

Shanghai Education
Publishing House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

1200219210



马岗《著》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面具背后

面具背后 面具背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面具背后/罗岗著. —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
2002.3

(学人文丛)

ISBN 7-5320-7515-X

I. 面... II. 罗...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1330 号

学人文丛

面具背后

罗 岗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
上海教育出版社

(上海永福路 123 号)

(邮政编码:200031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4 字数 187,000

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,150 本

ISBN 7-5320-7515-X/G·7664 定价:(软精)17.80 元

目录

别抚新编

- 2 学人·学问·学风
- 11 从“晚清”到“当代”
- 26 个人与乌托邦之间
- 37 解释历史的力量
- 53 韦伯翻译与中国思想界
- 60 顾准与韦伯
- 68 从“卤水罐”到“枣木扁担”
- 76 理论的“傲慢”与“偏见”
- 84 谁之公共性？
- 91 穿透记忆的声音

读罢飞雪

- 96 思想的“症候”
- 99 “家”和“家中人”
- 102 知 音
- 105 对 手
- 110 土地的歌哭
- 114 红旗开处……
- 116 命运的踪迹
- 119 面具背后

- 122 “现代”的诱惑
- 127 传统与变革
- 129 学术脉络与思想眼光
- 133 “技术小说家”与秦淮说书人
- 135 朱文的“新小说”：皇帝的新衣
- 137 学者散文：“风致”与“气味”
- 139 遭遇流行
- 143 复制或“盗版”：从“廊桥”到“画廊”
- 146 城的故事
- 148 “真实”的沉默
- 151 莎士比亚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
- 154 思想的地平线
- 157 丰富的痛苦
- 159 文学“双城记”
- 163 迷惘的“叙事”：利奥塔的“后现代”
- 166 无法逾越的“边界”：“索克尔事件”的余音
- 168 一篇读罢头飞雪：汉娜·阿伦特的再生
- 172 学会聆听：初识奥康纳
- 176 抽象画与铁路会车站

宿火夜谈

182 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

200 理想主义的昨天与今天

218 几重山外从头说

226 寻求“第三条道路”

254 附：重建统一的个人生活(王晓明)

別 抚 新 编



学人·学问·学风

1. 聚书散书

周作人在给朋友的信中感叹：“近来无钱买书，稍觉无聊，殆犹妇女之不能买衣饰欤？”（《致江绍原》1927年9月27日）将文人买书与妇女买衣饰相提并论，似乎暗合英国藏书家爱德华·纽顿的一句笑谈：“不替妻子买新上衣，而是送给她这本书，这是我买大多数书的方法。”其实，在书与人的关系上，中国文人少有西洋式的轻佻调笑。王国维曾说：“余平生惟与书册为伍，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，亦惟此耳。”他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排云殿前昆明湖，在遗嘱中将处理藏书一事委托给陈寅恪，故陈寅恪挽联有云：“五千卷牙签新手触，待检玄文奇字，谬承遗命倍伤神。”朱光潜晚年，曾让一位到他家的年轻朋友任意从他的书架上选取看中的图书。年轻人不肯，朱先生就自己抽出两部，强要他带走。一部《红楼梦》，一部《西厢记》，都是特装本，书顶、书口刷过金粉。曹聚仁说，这叫“散书”，晚年自觉病体日益沉重，决意将藏书中比较好一点的版本分别送掉。“愿祝化身千万亿，有书分饷读书人。”（张元济）这在后人眼中，颇有些悲凉。但书与有缘人，未尝不是件幸事。“文革”浩劫，俞平伯的藏书被彻底查抄，席卷一空，当日几无书可看，他留下这样的诗句：“屋角斜晖应似旧，隔墙犹对马缨花。”聚散离合，非关人愿。书却是一定要买的。你瞧，没过多少天，周作人又说了：“近日少买书，但亦不能戒净，稍搜三四种关于希腊文学宗教的书，虽在黄连树下亦颇不能忘弹琴也，可笑之至也。”（《致江绍原》1927年11月1日）

2. “菩萨”与“导师”

熊十力自称为“熊十力菩萨”。他的名中“十力”二字,在佛教经论(如《大智度论》等)中是用来赞美佛祖释迦牟尼的;他写的《新唯识论》(文言本)上署有“黄冈熊十力造”的字样,“造”字是菩萨著书才用的,凡人写书只能用“著”字;他和湖北老乡废名争论佛学问题,相持不一,以致动手扭打,除了意见分歧,最主要的恐怕因为两人都以“佛”或“菩萨”自居,争论时废名常说:“我的意见正确,我的意见是代表佛的,反对我就是反对佛。”这叫熊十力如何能够忍受?

1940年,熊十力应邀到重庆北碚金刚碑梁漱溟主持的勉仁书院住院讲学,勉仁书院几乎人人都是梁漱溟的门人,视老师为圣贤,这使熊十力心中很不是滋味,尤其有一次他读到梁漱溟的一篇文章,梁漱溟在文章中谈及自己曾舟中历险,却处变不惊,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斯文在抱的,他一死,历史就会改辙,斯文就要绝灭,老天爷是决不会让他死的。熊十力读后,觉得梁漱溟竟敢以道统自任,写信痛斥他太疯狂,梁漱溟回信却说:“狂则有之,疯则未也。”

胡适在美留学时,也曾有过“为他日国人导师”的念头,后来这一想法有所改变(参见《胡适留学日记》1915年5月28日)。但几年后,朱经农问他:“我们预备要中国人十年后有什么思想?”他在日记中特别记下:“此一问题最为重要,非一人所能解决也,然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耳。”(《胡适留学日记》1917年1月27日)

菩萨、圣贤、导师……乃至“引起疗救的注意”(鲁迅语)的医生,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如此的角色自居,产生异常迫切的

救世心态,其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人的狂妄自大或独断自信,而是源于严厉峻急的“救国保种”的历史情境。一方面是历史变动时代拆裂留下的意义空缺,一方面是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的道义责任和人间情怀,两者的契合,将准备不足的知识分子推上了前台,他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所扮演的“角色”之中,无论悲剧或是喜剧,戏已开场,落幕时分遥遥无期……

3. 朝市之学

熊十力除著述外,最大心愿即是讲学,他在《十力语要》中有极扼要的说明:“今日爱我者,皆勖吾以著书,不知斯人陷溺已深,先圣之遗训,丧失略尽。区区著书,岂足挥鲁阳之戈,以反坠日乎?吾痛心及此,而不能无意于讲学也。”1946年,徐复观把熊十力的新书《读经示要》呈蒋介石,并告以熊十力欲办书院讲学却无钱的窘况。蒋介石令何应钦拨款法币200万资助,但被熊十力婉言谢绝。熊十力在1946年6月7日给王孟荪转徐复观的信中,提及自己年老,生命力已亏,故决不办研究所,并要把何款退回。显然这是场面上的托词。同年6月在直接给徐复观的信中,熊十力才说了真心话:“研究所不独今日无精力,以事势论,亦宜罢。昔时本意,原专藉乡谊(专字吃紧),纯是民间意味,则讲学有效,而利自在国族矣。若声气渐张,在我虽无夹杂,而如斯浊世,人心险如山川,妄猜妄诬,吾个人不足惜,其如所担负之学术何。章太炎一代高名,及受资讲学,而士林唾弃……”早在抗战期间,1939年9月,蒋介石曾面请方东美办一杂志,阐扬文化思想,批判唯物论,方东美以不惯行政事务为辞婉谢。但在重庆,他以布衣身份先后为蒋介石讲黑格尔哲学、王阳明哲学以及《易经》哲学,蒋执弟子礼。

钱钟书有一名言：“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，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。”作为个人原则或理想境界，此话不无道理，按之于现实，则未免失之飘渺。1972年3月，钱钟书夫妇作为第二批“老弱病残”人员，能从学部干校提前调回北京，全赖毛泽东诗词英译小组见召。马克思在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》中，引用黑格尔的一段著名论断，“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把哲学当做私人艺术来研究，哲学具有公众的即与公众有关的存在，它主要是或者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”，并加以扼要的评语，“可见，连哲学在‘本质上’也得依靠国库”。这句简单明了的话令人深思。特别在中国，学术几乎无法规避与国家、社会、民族之间的往还，冷静的学术研究背后潜藏着急切的政治热情。熊十力将这点看得比较清楚，1949年初他给张其昀写了一封长信，由从军革命讲到改造唯识，再三辩明自己决非独善其身的自了汉。在信的结尾处，熊十力真情流露：“余之一生，非忘怀世事，亦非故意与人不合，孤遁鸣高，盖决志于学问一途，不得不与世绝缘，而所以志乎学者，则又出于实感之不容己。虽人生之感，至为复杂，而生于衰乱，首谋革命，则族类兴衰尤为情之所寄……”

渴望远离“朝市”的“清白学术”，是知识分子心中永远的乌托邦。罗兰·巴尔特曾将学府称之为“历史的最后策略之一”，它处在“权势之外”，“是权势鞭长莫及之处”（《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讲座就职讲演》）。但大多数知识分子“一生在两个问题上探求不已，一个是人生的根本问题，一个是现实的社会问题”（梁漱溟语）。如果你不愿放弃自己的基本立场，不为一个原则牺牲另一个原则，那么你能“戴着镣铐来舞蹈”，一面在学术中竭力抵制“朝市”的侵扰，同时又意识到这种侵扰无所不在，无时不有。在夹缝中求取舒展心灵的空间，知识分子的可悲与可叹，恐都在于此。

4. 大学内外

1915年，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与英文教授亚丹先生（professor D. O. Adams）晤谈。亚丹问：“中国有大学乎？”胡适无言以对。又问：“京师大学何如？”他只能据所闻而答。亚丹说：“如中国欲保全固有之文明而造新文明，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。一国之大学，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，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。国之先务，莫大于是……”亚丹这番话对青年胡适刺激很大，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奋笔疾书：“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，英国之康桥、牛津，德之柏林，法之巴黎，吾死瞑目矣。嗟夫！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！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大国乎！”第二天他还心气难平，写下了更激愤的一段话：“国无海军，不足耻也；国无陆军，不足耻也！国无大学，无公共藏书楼，无博物院，无美术馆，乃可耻耳。我国人其洗此耻哉！”（《胡适留学日记》1915年2月20日、21日）第二年初冬，蔡元培从法国归来，接掌北京大学。本来他对担任北大校长一事颇为踌躇，与朋友商讨数次，最终觉得：“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，然改良之策，亦未尝不可一试，故允为担任。”翌年1月4日，他到校视事，进入校门时，校役们照例在两旁深深行礼，以示欢迎。这位新任校长竟摘下礼帽，鞠躬还礼。向来不受重视的校役们对这一举动惊诧不已，觉得这位平等待人的蔡校长与以往的校长大人似乎很有些不同。果然，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一扫官场习气，迅速成为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，在以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进程中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。蔡元培在给汪精卫的信中曾这样陈述心迹：“在弟观察，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，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，而

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，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。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，欲不任大学校长，而卒于任之者，亦以此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现代大学体制在中国的发展、完善，对大学体制的批判也日趋激烈。一是大学学潮绵延不断，学生起事罢课，虽常有国事的刺激，但具体针对的往往是校务校政；二是在校的教授对校政亦多有批评，常借助舆论的力量，将校方的黑幕曝光。女师大风潮时，鲁迅撰写的一系列抨击学校当局的文章，人们已经非常熟悉。后来他到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，对这段治理学校时光，鲁迅并无好感，“学校大事，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，与别的一切学校同。于是点头开会，排时间表，发通知书，秘藏题目，分配卷子，……于是又开会，讨论，计分，发榜”，以及进行其他无聊或无聊的辩论，鲁迅戏称为是“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”（参见鲁迅：《在钟楼上——夜记之二》），他最终跑到上海，弃教鞭而从笔杆，其中的象征意味耐人寻味。

偏激如郁达夫者，自称：“活在世上，总要做些事情，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我这零余者，教我能够做些什么？”（《写完了〈莺萝集〉的最后一篇》）现身说法地抨击大学教育，流露出极端悲观的情绪。熊十力虽也对现行的教育体制深致不满，“吾深感今日著书，决不济事。今人从小学至大学，所见所闻，皆与大道背驰，其日蔽于浮杂知见者大深，欲其看吾书，谈何容易”。但他更想在体制之外寻找新的办学途径，“今诚欲学者敦事业，求真理，则非可徒事著书而已，必亲教人焉，然后可冀此道大明，而不至于晦也……”（参见《十力语要》）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民间的书院教育重新兴盛起来，如果说从前的书院，譬如杨仁山居士创办的金陵内学院，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多地汲取了新式学堂的成分，那么抗战军兴，文化中心随战争漫延而散落，在大后方崛起的三大书院，即1939年春马一浮

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办复性书院；次年，梁漱溟在重庆北碚金刚碑主持勉仁书院；张君勱在云南大理办民族文化书院，倚重的是传统文化资源，直接承续宋明自由讲学精神。1948年，国共交战正炽，熊十力门人程兆熊还是接纳牟宗三的建议，在江西铅山鹅湖办鹅湖书院，算是替老师遂了一场心愿。

书院教育虽然成绩斐然，但也困难重重。一方面是书院自身有着被逐渐体制化的可能，譬如勉仁书院先后被改组成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和勉仁文学院。另一方面，大学体制是社会教育制度的主流，书院始终处于“边缘”和“弱势”的地位，随时有被鲸吞的可能。唐君毅诸先生主持的新亚书院和新亚研究所，在香港苦苦撑持数十年，它们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分合际遇，最清楚不过地显示出书院教育在现代社会的命运。

5. 东南学风

1923年1月9日，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国学研究所作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》的演讲，他说：“这边的诸同学，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，这是很好的现象。自然，我也闻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，但是只要旧的是好，守旧又何足诟病？所以我很愿此次讲演，更能够多多增进诸君以研究国学的兴味。”称“南京学生守旧”，是当时流行的看法，恐怕并不准确。1922年1月，标举“论究学术，阐求真理；昌明国粹，融化新知；以中正之眼光，行批评之职事；无偏无党，不激不随”宗旨的《学衡》在南京创刊，《学衡》社的主要成员是东南大学的教授，他们不是留小辫穿长衫墨守祖宗家法的老古董，而是飘洋过海，自以为在西天求得真经的留学生，满脑子“吾国文化今日之濒于破产，惟吾欧美留学生为能致之，而旧文化与国民

性之保存,使吾国不至于精神破产之责,亦惟吾欧美留学生为能任之”(胡先骕:《论今日教育之危机》,《学衡》第4期)的心思。柳诒征说:“梅子吴子同办杂志曰《学衡》以诏世,其文初出,颇为聋俗所诟病。久之,其理益章,其说益信而坚,浮薄怪谬者屏息不敢置喙。则曰,此东南学风然也。”(《送吴雨僧之奉天序》,《学衡》第33期)

“东南学风”的存在,其实早有人注意。苏渊雷为《柳诒征史学论文集》作序,将东南大学的史学研究,与北大、清华相提并论,在学术脉络的梳理中凸现柳诒征的治史成就,“史学革命于是乎兴。新会梁任公首发其难,揭‘四蔽二病’之论,余杭章太炎亦有‘新史目’之拟议。发凡起例,耳目一新。继此者或偏‘疑古’,发古史层累、踵事增华之说;或主‘证古’,取材地下补证古书,立‘二重证据’之法。顾皆鲜能退而述作,以行其所知者。史家之闻斯行之,穷年兀兀,著书满家者,以所愚知,其惟丹徒柳翼谋先生乎”!所发言论,针对具体人事,限制了他的眼光。但苏渊雷拈出“退而述作,以行其所知”的要点,可谓慧眼独具,颇能道出“东南学风”的精义。

《学衡》出到第79期,于1933年7月终刊。但杂志上刊登的启事却说:“自第八十期起,改由南京钟山书局印行,编辑职务亦改由缪风林君担任。每年出版六期。”由北京重回南京,似乎预示着某种传统的恢复。这则启事虽没有兑现,但早在1932年9月1日,钟山书局创办了《国风》半月刊,由柳诒征任社长,张其昀、缪风林、倪尚达任编辑委员。杂志承《学衡》之余绪,继续标举“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,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”的宗旨,直到抗日战争爆发,才被迫停刊。1941年8月,原《国风》社成员张其昀在重庆创办《思想与时代》,创刊号上刊载贺麟的《儒家思想的新开展》,提出“新儒家思想”的概念。1947年1月,牟宗三与钱穆的弟子姚汉源在南京创办《历史与文化》,强调“吾民族活动之历史精神,端在孔孟之学统”。

(《本刊旨趣答问》,《历史与文化》第1期)同年5月,已服膺熊十力学说的徐复观也在南京办《学原》杂志,宣扬“中国文化”,被称为“新儒学”。当代新儒学的主要人物熊十力、钱穆、唐君毅、牟宗三等,在《学原》上发表的文章,就有二十余篇。

结合“东南学风”的特点,考虑到南京高师、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学校沿革,从《学衡》、《国风》等杂志的变化发展中,摸索、探究新儒学生嬗变的轨迹,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值得花大力气梳理的一条线索。“学术在天壤,惟人能宏之……视昔之所播于东南者,益声大而远,岂惟不局于一学校,抑亦不局于一地、一群、一社、一时之事矣”(《送吴雨僧之奉天序》)。柳诒征在近七十年前说的这番话,今天看来,是很有些先见之明的。

从“晚清”到“当代”

——关于“现代性问题”的几则笔记

晚清思想中，章太炎和刘师培两大家最为复杂。因其与现代思想接触时，凭借之资源殊异于时流。对刘师培的文学观和文学史写作，也应作如是观。

讨论刘师培的文学史写作，我觉得面临的两大问题，一是他的文学观，作为文选派大师，他对“文”的界说，一方面继承了魏晋以来“文”、“笔”之辩的余绪，特别是清代“文选派”重镇阮元的《文言说》对“文”的解释：“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，错综其言而自名曰‘文’。”刘师培在《广阮氏文言说》、《与人论文书》、《文说》和《论文杂记》诸文中对此意多有发挥。由这种辩论可以引发一系列分疏：文/笔，骈/散，有韵/无韵……而这一分疏背后是汉和宋、文选和古文、选学派和桐城派之间的紧张与对立。其中蕴含着独特的中国的‘文’的观念，和新兴的现代“文学”观念构成了某种联系，恰好呼应了五四新文学的兴起。这就是日本学者木山英雄讨论的“文学复古”与“文学革命”的关系，尽管他主要关注的是章太炎，但按之于刘，也言之成理。从“观念”（力倡“文”“言”之别）而非“形式”（“错综比偶”之骈体文）来看，刘师培的文学观或许更接近与契合现代“文学”观念。准确地说，章太炎是从‘杂文学’而刘师培是从‘美文学’的角度立论，两者虽有异同，甚或间有辩驳（章刘之比较